

中国共产党

国情认识史

刘继增 张葆华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538629

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

刘继增 张葆华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

刘继增 张葆华 主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 1插页 33万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7—216—00544—9

D·116 定价：5.75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探索.....	13
一、一幅被改良派歪曲了的社会图景.....	13
二、早期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中国社会.....	18
三、朦胧的“国情”问题的提出.....	24
四、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29
五、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37
六、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剖析.....	50
第二章 中共在第一次历史转变时期对国情的考察.....	58
一、“民族资产阶级叛变”说与“工农小资产 阶级政府”说	58
二、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分析.....	65
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再认识.....	73
四、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理论根据.....	77
五、国情认识的首次哲学总结.....	84
六、农村状况的分析与土地革命的政策.....	89
第三章 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100

一、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内各党派对国情的认识	100
二、新生命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论点 和马克思主义派的批判	110
三、动力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论点和马克 思主义派的批判	117
四、中国社会史问题讨论	124
五、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128
第四章 中共在第二次历史转变时期对国情的认识	138
一、对中国经济性质和政治特征的错误论断	138
二、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143
三、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的一次飞跃	151
四、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科学分析	157
五、毛泽东论国情认识的方法论	163
六、对中国国情问题的全面论述	170
第五章 40年代中共对社会特点认识的深化	178
一、一次国情认识方法论的教育运动	178
二、对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社会性质的分析	184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辨析	192
四、对国统区殖民地化的揭示	200
五、扫除农业社会主义空想	207
六、对中国农村社会特点认识的深化	213
七、全国解放前夕党对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深 刻认识	222
第六章 对我国社会转变时期历史特点的认识	230
一、对建国初期错综复杂情势的分析	230

二、敌情估计	236
三、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论争	242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国情考虑	247
五、对农民两种生产积极性认识的分歧	252
六、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提出的国情认识	259
七、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和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	266
 第七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国情认识上的曲折	272
一、主要矛盾正确判断的轻率改变	272
二、“共产风”严重泛滥的原由	278
三、一个盲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	283
四、中共在纠正“大跃进”错误期间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	288
五、敢于实事求是分析客观情势的一个范例	294
六、人为延长了的“过渡时期”	301
七、对阶级斗争情势的“左”倾估计	306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国情的错误估计	312
一、对建国十七年工作成就的错误否定	312
二、脱离实际的阶级估量和虚构的党内资产阶级	320
三、“五七指示”所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	329
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337
 第九章 国情认识的历史性转变	345
一、徘徊中前进的国情认识	345

二、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 出来	350
三、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重新 认定	355
四、民主问题的思考	361
五、人口问题的再认识	368
六、对我国农村经济现状的分析	374
 第十章 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的形成	 381
一、对我国经济体制特征的分析	381
二、对三个经济带发展不平衡的认识	387
三、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392
四、“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提出的国情依据	399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	405
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409
 后记	 417

前 言

党的十三大以来，人们提高了对国情认识的自觉性，越来越多的同志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重要的国情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正确解决建设和改革实际问题的基本依据。为了对我国处于大变动中的国情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需要对社会主義初级阶段的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科学的论证；也有必要从新的时代高度出发，循着国情认识的轨迹，作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思考，从而达到充分了解过去、正确认识现在、科学把握未来的目的，为深入和拓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作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需要人们从多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在这里，我们仅就它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意义及其发展过程，谈谈粗浅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的研究任务，是探讨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社会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从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国情”是一定期限或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基本情况的总称，它的核心是社会性质。国情与形势不同，它不象形势那样变化迅速，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现代国情的发展变化，至今大体经历了三个

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逐步形成而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才告结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49年建国开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属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这一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日起，我国则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不断结合的历史，党对国情的认识主要是围绕着上述三个阶段的社会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而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就是要揭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其特点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发展；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阐明这些理论观点的作用和地位；探讨这些理论观点产生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渊源。这些理论观点在不同时期表现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是围绕着下列内容展开的：

第一，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这是国情认识首先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旧中国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并呈现出结构的多层次状态。在国民经济中，近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在工业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很小；在重工业内部，门类残缺不全，经济上不能独立。农业生产经营以手工劳动为特征，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其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劳动生产力极低。这种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式，内部结构很严密，具有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特点。社会生产力本已十分落后，再加上长年不断的战争动乱，更加受到严重破坏。总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表明，对社会生产力实际状况在估量上的重大分歧，往往成为政治上分野的先导。建国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对生产力发展过程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由此而来的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认识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多次曲折，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关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在经济上，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并存，近代式的若干得到畸形发展的城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并存；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其中以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汉族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突出，这是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活动和中国历史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工业上从原始生产工具到近现代机器的各个层次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并存。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反动统治阶级长期的混战、分裂和不统一；强大的敌人控制着中心城市，但广大农村则是其统治薄弱的地方。政治上的不平衡状态，建国后得以根本解决，但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革命发展不平衡，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则是极其深远的。历史证明，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在指导思想上是否能对中国社会不平衡特点作出科学的估计和客观的分析，往往成为兴衰成败的关键。

第三，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东方矛盾的汇合点，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与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成为国情认识的一大课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建国初期，主要矛盾呈现出多元和交替的状况；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以后，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研究和判断，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战略策略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

第四，关于阶级分析和阶级关系。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因而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在这个东方大国中，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和它们紧密结合的官僚资产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两面性。无产阶级的队伍不大，但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无产阶级除了能够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以外，还能从其他一些阶级和阶层中找到同盟者。用客观态度去分析近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并且同对每个阶级、阶层的发展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是革命政党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迷离混沌的社会中发现规律性的一条指导性的线索。

由于中国国情问题范围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过程所涉及的内容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除上述问题外，还有如帝国主义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问题，一定时期的客观情势问题，国际比较和曲折道路问题，以至人口的数量与素质、土地概况、资源分布、民族关系等问题，也都是认识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的重要课题，只是因为这些问题，一般可以结合上述有关内容进行阐述，所以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二

研究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遵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吸取国情认识的历史经验，是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首先，它是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需要

科学论断我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总结包括民主革命

在内的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回顾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国情认识的经验教训，从而深刻领会：我们事业的成败，路线方针的正确与否，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归根到底，就在于是否真正从国情出发。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怎样找到的？认清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对这条道路的形成有什么意义？共产党人在探索这条道路的实践中，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来，遇到的主要障碍和主要危险是什么？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对于新时期的建设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方面的准备。从党对中国现代国情认识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求正反两方面的答案，是一条可靠的途径。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国情时，必须注重这些特点。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发展革命运动，直至进入社会主义的大门，既不能照抄书本条文，套用什麼普遍公式；又不能照搬外国经验，简单袭用什麼外来模式。恰恰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找到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正是在同教条主义作长期的斗争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才得以实现的。

深化国情认识，同反对教条主义密切相关，这是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从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期，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错误，比较突出的有三次。一次是五四时期。那时，先进的人们对封建的老八股、老教条进行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批判，建立了历史的功绩。但是由于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人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和外国事物，存在着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形成洋八股、洋教条，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第二次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共党内有一部分人犯了新的形式主义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

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国革命的道路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才逐渐形成和明确的。第三次是在建国以后，我们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也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随后才进一步关注中国客观的经济规律。现阶段，我们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也面临破除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的伟大任务。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局高度，深入系统地对六十多年来国情认识的发展过程，进行综合研究，以便鉴往知来，通古启今，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掌握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认清其发展规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制定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

其次，它是提高国情认识自觉性的基本方法

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要求深化国情认识，提高人们在这方面的自觉性。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国情认识的自觉性呢？这就需要对国情认识的过程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恩格斯说得好：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同样，提高国情认识的自觉性，也需要采取历史回顾这一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今天的国情认识，既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系统的调查研究，横向剖析；也是昨天对中国这个客观实际认识的发展，纵的联系。历史不应当割断，回顾和总结过去，是把握现在、科学地预测未来的基本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取得彻底胜利？根本原因是在这段时期里，中共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并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性质及其特点，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找到的？主要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正确的认识国情开辟了道路，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分析历史前提、研究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的，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途中之所以犯“左”的错误，尤其是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当然有其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从指导思想上看，归根到底，则在于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是从原则出发，漠视或脱离了我国的实际。通过国情认识的回顾与思考，人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取得成就、胜利，或是遭受挫折、失败，都同党是否对国情作出科学估量，同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是否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关系，从而吸取历史经验，提高探讨国情的自觉性。

再次，它是深化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从科学学到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科学社会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这个过程，既是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曲折发展的再认识过程，这种再认识意义重大，它有助于人们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求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又是国情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国情认识是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础，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客观进程和历史必然性，就应十分注重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的研究，使社会主义再认识适应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这一时代的要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表明党对国情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它的得来是很不容易的。正如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一样，党对我国社会现在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急于求成、头脑发热，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那个时期虽然不长，但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却在很长时期内给我们的建设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曾经长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的界限，结果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党的十三大能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与之相适应的基本路线，是几经曲折，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通过国情认识史这部活教材，十分珍惜、认真学习并牢牢掌握这个来之不易的科学理论，深化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更加脚踏实地、更加清醒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三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是很复杂的，进入近现代之后，各方面的矛盾更表现出激烈的斗争，激烈的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演进过程。党对国情认识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循着认识的规律曲折前进的，这正是社会实践的曲折性和反复性的反映。

五四运动时期，各政党、各派别、各方代表人物，在思考自己国家命运和提出治国方案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认识国家的过去状况和现在状况，即认识国情。在那时，以建立西

方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运动，不论是革命的还是改良的，均已陷入绝境，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尽管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曾经提出过种种的救国方案，采取过多种的活动方式，但他们的活动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从认识的角度看，主要则是由于运动的领导人或政治派别，受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看不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懂得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所以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七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中国人民历尽艰难困苦，逐步明确了斗争的出发点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在它幼年时期，就显示了在中国思想界和政治舞台上巨大的新的活力，并在革命进程中，成为科学认识国情的主体和先导。

但是，有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并不是说对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对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的清醒估量，就不需要经历一番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独创过程。由于近代中国是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集结在一起，社会动荡剧烈，历史条件特殊，因而大大加重了国情认识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革命就是要把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但人们单凭头脑里设想一个新世界的蓝图，这种改造是实现不了的；只有从旧世界的实际出发，即从国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改变落后的国情，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因而一开始就能较好地抓住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并朦胧地提出了国情问题。随后，又对社会性质、阶级和阶级关系以及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等问题，作了首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而为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大革命的广泛发动，提供了制定和执行

路线、政策的基本依据。经历对国情的反复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清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总结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的科研成果，才深刻地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才完全掌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正是从这点出发，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有必要估计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一场论战。这场遍及当时中国的主要政党和政治派别的论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重要论战，它在国情认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大革命失败至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无论在其理论性还是现实性上，无疑是上升了，深化了，特别是在与各种不同认识——如中国第三党、中国托派、胡适派、乡村建设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复论争中逐渐成熟了，形成了现代国情认识史上的一次较大的浪潮。早在1928年冬，蔡和森就指出，实际上，中国国情、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问题在中共诞生以前就出现了，所以这并非什么新话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解决，因而在大革命后，在社会各阶级的格局、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发生巨大变动之后，重提这一问题，就自然被赋予了新意（《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当时，国内局势急剧动荡，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还需不需要革命？中国需要什么性质的革命？成为摆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面前的头等紧要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中国国情，即中国社会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于是，各党各派竞相发表自己的观点，从而表现为政见上的针锋相对和论坛上的众说纷纭；各种各样的立场观点又反过来结成了更多的党派，投入或形成新的论战。共产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并尽可能地参考了其他各派占有的资料，对国情作了更为有理有据的论述。同时，共产党人还揭露批判了